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129-139.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09mucis>



济慈《拉米亚》中的边际效用与理想国度建构

程文（Cheng Wen），叶可（Ye Ke）

摘要：从文学经济学视角解读济慈叙事长诗《拉米亚》，可揭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经济思想为人忽视的侧面。杰文斯边际主义的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与动态均衡原理，虽形式化于济慈身后半个世纪，但浪漫主义与边际主义对主观欲望的共同关切足以弥合这一时代落差。文学经济学的互构、同形、同归三个层次，依次聚焦诗的生产、诗中的消费与诗中的交易。其一，新历史主义视角下文学与历史的互构：诗人的财务焦虑与摄政英国的商业转型彼此塑造，诗作的经济潜文本是其存在的条件。其二，文学与经济学的同形（isomorphism）：利西乌斯痴迷欲望的递减回报与边际效用曲线构成同一过程结构的两个实例，拉米亚宫殿东方化、女性化的奢华则是一种待戳穿的幻象。其三，微观经济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对理想国度愿景的同归：拉米亚、赫尔墨斯与仙女之间的谈判以自利之扰动打破克里特田园与科林斯城邦的均衡，悲剧结局表征诗人对无节制消费主义的拒斥。诗作以否定的方式勾勒出使价值重归真实需要、使相反力量重归动态均衡的理想国度。

关键词：约翰·济慈；《拉米亚》；文学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同形；动态均衡；理想国度

作者介绍：程文（通信作者），副教授，宁波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电子邮箱：chengwen@nbu.edu.cn；叶可，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1184926692@qq.com。

Title: Marginal Ut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al State in Keats's *Lamia*

Abstract: Reading Keats's narrative poem *Lam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conomics brings into view a neglected facet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British Romantic literature. Although the subjective value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dynamic equilibrium of Jevonsian marginalism were formalized half a century after Keats, the shared attentiveness of Romanticism and marginalism to subjective desire suffices to bridge the temporal gap. The three levels of literary economics—mutual construction, isomorphism, and convergence—focus in turn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poem, the consumption it stages, and the exchange that drives its plot. First,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under New Historicism: the poet's financial anxiety and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Regency Britain shaped each other, making the poem's economic subtext a condition of its existence. Second,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the diminishing returns on Lycius's obsessive desire and the marginal-utility curve emerge as two instances of one process-structure, while the Orientalized, feminized opulence of Lamia's palace is an illusion awaiting disenchantment. Third, the convergence of microeconomics and Romantic literature upon the vision of an ideal state: the negotiation among Lamia, Hermes, and the nymph disrupts, through the perturbation of self-interest, the equilibrium of both the Cretan pastoral and the Corinthian city, and the tragic denouement—Lamia's vanishing and Lycius's death—signifies the poet's rejection of unrestrained consumerism. By negation, the poem delineates an ideal state in which value is reattached to genuine need and opposing forces are restored to dynamic equilibrium.

Keywords: John Keats; *Lamia*; literary economics;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isomorphism; dynamic equilibrium; ideal state

Author Biography: Cheng We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superviso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at Ningbo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chengwen@nbu.edu.cn. Ye Ke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Ningbo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184926692@qq.com.

近二十余年来，“新经济批评”已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抒情理想主义独立于其时代经济生活之外的成见，费曼尼斯（Porscha Fermanis）与塔戈尔（Proma Tagore）等学者的研究均表明，济慈对金钱、债务、奢侈与文学市场有着敏锐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其诗作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迹（Fermanis, 2006; Tagore, 2000）。然而学界对济慈作品的关注并不均衡，《伊莎贝拉》（*Isabella; or, The Pot of Basil*）一再被用以剖析阶级、资本与商品化，而济慈最后一部叙事长诗《拉米亚》

（Lamia）的经济维度则相对少人问津。如果说《伊莎贝拉》展现经济力量对个体的压迫，《拉米亚》所表达的则是某种更宽广也更现代的东西：经济行为尤其是消费对整个社会的作用。

《拉米亚》可被读作对消费主义的隐喻式批判，更确切地说，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一种文学预演。这一规律要到半个世纪之后才由杰文斯（W. S. Jevons）在《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中加以形式化：价值并不内在于物品，而源于个体对效用的主观估量，凡能带来快乐或免除痛苦之物皆可能具有效用（杰文斯，1984, p. 38）；随消费数量的上升，总效用以递减的速率上升，最后一单位的效用最终随数量增加而降低（布鲁、格兰特，2008, p. 167）。《拉米亚》以叙事形式呈现的，恰是这条满足递减的曲线，以及那种试图挣脱这条曲线、却愈陷愈深的升级消费。

微观经济学思想萌生于浪漫主义时期。18 世纪末，工业革命已近百年而未能解决英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迫使人们突破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另寻出路（布鲁、格兰特，2008, p. 166）。19 世纪初，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杜普伊特（Arsène-Jules-Émile Dupuit）与冯·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相继将边际分析引入经济问题（布鲁、格兰特，2008, pp. 170—179），至 1871 年杰文斯发表《政治经济学理论》，边际主义学派方告奠立，史称“杰文斯革命”（Roncaglia, 2017）。就思想的深层结构而言，浪漫主义与边际主义共同促成“主观转向”：加尼耶（Regenia Gagnier）的研究发现，二者都拒绝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价值理论，转而以消费主体的欲望为中心，经济学与艺术中的价值由此同样变得更“主观”、更“心理化”（Gagnier, 2000）。布朗克（Richard Bronk）则将想象力与浪漫主义感受力重新发掘为经济推理自身内部的资源（Bronk, 2009）。济慈写作《拉米亚》的 1819 年，正处于这场双重转向的中途。因此，以杰文斯阐释济慈，不是以后起的理论强加于诗作，而是让同一历史土壤中生长出的两种话语互相印证。

杰文斯区分了“需要”与“欲求”。他并未声称满足在各类物品间均质：食物、水这类简单的动物性需要一旦满足，其最终效用便趋近于零；而对艺术品、学问、古玩这类精神欲求，则不受递减原理制约（杰文斯，1984, p. 61）。奢侈性消费恰恰占据了两者之间危险的位阶：它脱离了需要那种可被满足的逻辑，却又不具精神欲求的超越品格，只能在真实回报递减之际模拟出欲望无尽攀升的假象。值得注意的是，杰文斯将经济计算归入最低等级的情感，明确将其与道德是非的更高演算区隔开来（杰文斯，1984, pp. 42—44）。

《拉米亚》所提供的，正是经济学自我悬置的那种道德演算。

文学经济学为本研究提供了互构、同形、同归三层分析框架。近年文学研究出现“经济人文”（Economic Humanities）转向，主张文学并非经济史的被动注脚，而是承载经济认知的知识形式（Crosthwaite et al., 2022, pp. 3, 13—14）；谢尔（Marc Shell）的《文学之经济》更早已确立从语言与经济象征方式的相似性理解思维与物质关系的方向（Shell, 1978, pp. 7—8）。已有研究以边际效用递减与动态均衡解读布莱克《耶路撒冷》的艺术创新与东西关系重构（程文，2024）。本文将这一路径延伸至济慈的叙事诗，并把文学经济学分析的三个层次依次界定为：其一，互构，即新历史主义视角下文学与历史的双向生成；其二，

同形 (isomorphism)，即文学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保持关系的映射；其三，同归，即微观经济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对理想国度的共同主张。这三个层次依次递进，互构言其生成，同形言其结构，同归言其旨归，分别对应诗的生产、诗中的消费与交易。

文学经济学解读有望为《拉米亚》聚讼纷纭的阐释之谜提供一条贯通的线索。诗作的反讽与暧昧历来令批评家困惑。科尔文 (Sidney Colvin) 表示对诗作“意欲在读者的想象同情上造成的效果”深感“困惑”。斯珀里 (Stuart Sperry) 从近乎自嘲的苦涩中读出“诗人与其更好的自我为敌”。贝特 (W. J. Bate) 则称其歧义交错、变换之快为英语叙事诗中所仅见 (Wolfson, 2015, pp. 119–120)。晚近的权威济慈研究恰为这条线索提供了双重支撑：罗 (Nicholas Roe) 的传记考订还原了诗作生成的商业处境 (Roe, 2012)，沃尔夫森 (Susan J. Wolfson) 的细读则揭示了商业逻辑织入诗歌语言肌理的方式 (Wolfson, 2015, 2022)。诗的叙事能否先于经济学理论半个世纪，预演一条效用曲线的形状，并给出经济学所悬置的道德裁断？问题的本质，回归到文学想象与经济规律的关系。

一、“那么一股火气”：财务焦虑与《拉米亚》的商业生成

文学与历史的互构是文学经济学考察的第一个层次。新历史主义所看重的并非单向的“背景—文本”决定关系，而是文本与语境的双向生成：《拉米亚》既被摄政时期的经济转型所塑造，也以诗的形式参与了对经济转型的认知与评判。“经济人文”转向更进一步主张，浪漫主义诗歌是承载经济认知的知识形式，而非经济史的被动附庸 (Crosthwaite et al., 2022, pp. 13–14)。沿此思路，济慈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便不应被化约为浪漫诗人对铜臭的简单厌弃。加拉格尔 (Catherine Gallagher) 指出，浪漫主义文学与政治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英国激进思想中同根而生、共享前提，其冲突之所以尖锐，恰因双方是在共同的基础上论战 (Gallagher, 2009, pp. 73–74)。康奈尔 (Philip Connell) 亦表明，浪漫主义对政治经济学并非置身事外的反商业潮流，而是亲和与回避并存的复杂关系 (Connell, 2001, pp. 1–5)。正是在这一互构的张力中，《拉米亚》的经济潜文本得以生成。

《拉米亚》诞生于英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之中。诗作完成于 1819 年 9 月，此时工业革命正加速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在使商业与制造业利益集团致富的同时，也壮大了领取工资的劳动阶级；贸易与帝国带来繁荣与全球优势，却也加深了不平等与劳工的苦难。济慈早在《伊莎贝拉》中便已探索这一主题。对《拉米亚》而言尤为关键的是，这些发展重塑了人们对消费的态度，随着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品的激增，消费日益成为社会身份与阶级区隔的标志。浪漫主义作家对此普遍心存疑虑，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对工业城市喧嚣的退避与对自然及简朴生活的反向坚持，即是这种疑虑的显例。

济慈个人的财务困境与《拉米亚》的经济意涵互为表里。1818 年 12 月，济慈的弟弟汤姆 (Tom Keats) 死于肺结核。据传记作家罗考订，汤姆的死讯引发了济慈在 1819 年 6 月间的财务困境。舅母玛格丽特·詹宁斯 (Margaret Jennings) 闻讯而动，拟向衡平法院递交索取汤姆遗产中源自祖母的份额，一桩沉睡约十年的家族遗产纠纷骤然重燃。遗产受托人阿贝 (Richard Abbey) 扣住汤姆的遗产不予分配，在此案了结之前，济慈从阿贝处再无款项可指望。罗特别指出，这场纠纷震动了济慈，并“将在他今年的诗歌中回响” (Roe,

2012, pp. 327–328)。彼时他被友人拖欠逾二百英镑，一度重新动念到药剂师处谋职，全赖布朗（Charles Brown）以待催回的欠款为担保先行垫资，并力劝他“再向出版界一搏”（Roe, 2012, p. 328）。就在这一窘境中，济慈开始筹划将伯顿（Robert Burton）《忧郁的解剖》中利西乌斯的故事敷演为他的第四部叙事诗（Roe, 2012, p. 328）。与此同时，移居美国的乔治（George Keats）因投资失败向他求援（Roe, 2012, pp. 333, 336）。济慈与布劳恩（Fanny Brawne）此时刚刚订下婚约，婚姻却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他资财不足又无稳定进项。在此情势下，用罗的话说，“写作已成必需”（Roe, 2012, p. 327）。《拉米亚》因此笼罩在一种双重困境之下，本可换来经济独立的文学劳作，恰恰受阻于那使独立显得迫切的激情。

济慈对诗作的商品属性有着坦率的自觉。当时文坛的商业化已蔚然成风：布里奇斯（Samuel Egerton Brydges）抱怨文学竟沦为一桩生意，实为恶劣的祸患（Brydges, 1834, p. 202）。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日后描述，恰在这数十年间，艺术家被视为不过是为市场生产商品的生产者（Williams, 1960）。济慈本人则在1819年9月致乔治夫妇的信中坦言，《拉米亚》“有那么一股火气，定能以某种方式抓住读者”，并补充道，读者想要的不过是某种感官刺激（Keats, 2002, p. 363；亦见 Roe, 2012, p. 328；Stillinger, 1974, p. 474）。诗人对市场口味的精明盘算，在同一个夏天还有更直接的旁证：他与布朗合写悲剧《奥托大帝》，为名伶基恩（Edmund Kean）量身定做，二人约定平分作者收益，指望它成为票房大卖之作（Roe, 2012, p. 329）。写于同一时期的《拉米亚》剖析商业诱惑，本身也成为文学市场上的竞争者。正如沃特金斯（Daniel P. Watkins）所言，济慈叙事诗的全部观念与情节皆植根于一组特定的经济关系（Watkins, 1989, p. 55）。由此可见，诗作的经济潜文本并非外加的装饰，而是其存在的条件。而要探究焦虑如何转化为诗的内在结构，我们须进入文本，考察欲望自身的曲线。

二、“沉重的金杯”：奢华幻象、东方主义与欲望的递减回报

文学与经济学的同形是本研究考察的第二个层次。新经济批评以同构（homology）为核心命题，揭示文学文本在隐喻、修辞与形式层面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对应（Woodmansee & Osteen, 1999, p. 4）；然而同构往往止步于两种结构因共同社会起源而彼此呼应，易流于单义因果。参考法国哲学家让-约瑟夫·古（Jean-Joseph Goux）的普遍等价物理论，可将文学经济学“同构”提升为更严格的“同形”：能指之于所指、价格之于价值、效用之于欲望，三者所对应的并非彼此的内容，而是各自充当“以有形表征无形”之普遍等价物的关系位置，从而构成保持关系的结构映射（Goux, 1990）；谢尔亦早已揭示语言与货币的同源关系及其趋于体制化的“顽固结构”（Shell, 1978, pp. 41–42）。据此可以论证：利西乌斯（Lycius）欲望的轨迹与边际效用递减曲线之间，并非松散的类比，而是同一过程结构的两个同形实例。

拉米亚（Lamia）与利西乌斯的故事承载着济慈对消费的反思。二人的故事在地理与道德上都从第一部克里特岛前商业的田园，移向第二部科林斯的居所。这一转移同时也是从欢愉无须购买的世界，转向为商业气息所浸透的世界。到了第二部，炫耀与奢靡走到前

台。沃尔夫森指出，第二部以对这对恋人的讽刺开场：利西乌斯由“痴愚的情人”（sap）一变而为“炫耀者”（show-off），急于在婚宴上展示他的“战利品”，好让仇敌艳羡、友人喝彩（Wolfson, 2015, p. 111）。

拉米亚的宫殿是奢华的缩影。它有“堂皇的门廊，建筑宏丽的庄园”（263）^①；每一处“壁龛”与“墙角的浮雕”都被装点得愈加华美（263）；每扇明亮窗格前都置有香炉，“香烟缭绕，须添加没药和香木”（264）；十二张圆桌上陈设“沉重的金杯”（264—265）。其中的华丽铺陈值得整段引述：

宴会大厅里是一片富丽堂皇，
到处是灿烂的灯火，扑鼻的芳香：
.....五十只炉里
五十道烟的花圈轻轻地飘起
直上屋顶.....
十二张圆桌.....
靠豹形爪子支撑，桌面上放置
沉重的金杯.....（264—265）

这座宫殿的辉煌本是无根的幻象。沃尔夫森注意到，婚宴的铺陈是一片花环意象的过盛，“五十只炉里 / 五十道烟的花圈”一类细节甚至“过于现成、过于易读”，仿佛在戏拟自身的繁缛（Wolfson, 2015, p. 117）。诗作的素材来源已先行点破繁华背后的空虚。在伯顿的原叙事中，拉米亚的全副陈设“并无实体，纯属幻象”，一经识破，便连人带屋、杯盘器物顷刻消散（转引自 Roe, 2012, p. 328）。罗更指出，这座科林斯郊外的宫殿令人不可抗拒地联想到济慈相识的谜样女子伊莎贝拉·琼斯（Isabella Jones）陈设时髦的寓所，她可能今日在家，明日便如拉米亚一般无处可寻（Roe, 2012, p. 329）。奢华在济慈笔下始终是待戳穿的幻象。

济慈刻意将这种奢华渲染为东方式的。拉米亚的豪奢系于来自东方与美洲的物品，丝绸、染料、黄金、异域木材，以及“新雕的松木，雕成棕榈和大蕉 / 长在林间草地上”（262）。费曼尼斯发现，济慈取材于当时关于东方奢华的故事汇编，同时化用关于奢侈如何腐蚀帝国罗马的历史叙述（Fermanis, 2009, p. 115; Robertson, 1769, p. 8）。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则进一步揭示，浪漫主义时期对东方的迷恋远不止是题材的点缀，它参与了帝国式自我的建构，个体主体性的确立与帝国对他者的征用彼此成全（Makdisi, 2009, pp. 603–604）。拉米亚宫殿充满东方化、女性化的奢华，同时也是利西乌斯自我“帝国”的舞台。他在对异域奢侈的占有中确认自身，却也在同一过程中被那奢侈所封闭、所抽空。

^①约翰·济慈（1997）：《济慈诗选》，屠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文所引《拉米亚》译文均出自该译本（第 240—270 页），以下引文只随文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正文论述采用通行译名“利西乌斯”“赫尔墨斯”“阿波罗尼乌斯”，诗行引文保留屠译“里修斯”“赫耳墨斯”“阿波罗尼”。

恋人们置身奢华，在睡眠中“留着爱情使之睁开的小缝 / 让他们入睡时见到对方的面容”（258—259）。一如《伊莎贝拉》中独守罗勒花盆、枯萎至死的女主人公所展示，全然遁入私域在济慈笔下是一种道德病症，而且终将致命。

利西乌斯的情感轨迹即边际效用递减曲线的文学显影。边际效用递减的实质是心理学的：物品超过一定量后，再增加将变得漠不相关甚至唤起厌恶（杰文斯，1984, p. 204）。拉米亚的在场最初带来巨大欢欣，但满足并不持久，利西乌斯发展出对更多占有与控制的不可满足的渴求。沃尔夫森以一组消费意象点明这一吞噬性的占有，利西乌斯“两眼把她的美貌一饮而尽 / 那只发愣的酒杯里一滴也不剩”，而叙事者更把这首诗的轻信读者径直归入“感伤的消费者”之列（Wolfson, 2015, pp. 116–117）。

利西乌斯的悲剧源于欲求范畴的混淆。杰文斯特别强调，对艺术品、学问、古玩这类精神欲求不受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制约（杰文斯，1984, p. 61）；利西乌斯却把一种被奢侈所制造、本质上仍属可餍足之需的占有欲，误认作那种不受餍足的精神欲求，于是愈消费愈匮乏，他自以为超脱其外，而递减的曲线却重新收紧。科明（Sarah Comyn）所论那个在叙事中反复现身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亦即出于自利在市场中作理性算计的抽象主体（Comyn, 2018），在他身上以反讽的形态显现。他自以为是欲望的主体，实则被欲望的结构所摆布。加尼耶对十九世纪欲望的论述则澄清了这一悖论的机制，她指出该时期的审美与消费主体由现代欲望的“不可满足性”（*insatiability*）所界定（Gagnier, 2000）。利西乌斯愈消费那幻象，幻象愈不能满足他，便愈发疯狂地消费。当哲人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冷峻的目光戳破幻象，利西乌斯在拉米亚消失的当夜身着婚服而死，崩塌的不仅是一段恋情，更是一整套由消费主义与奢侈价值支配的世界观。诗的文本结构与经济学的效用结构在此若合符节，构成文学与经济学同形关系的一个范本。而当欲望从私人执念扩展为交换关系，同形便进一步上升为对均衡与国度的想象。

三、“凭我的蛇杖”：商业谈判、外部性与动态均衡的理想国度

微观经济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对理想国度的共同主张，是考察的第三个层次。动态均衡原理认为，各种经济力量通常趋于均衡、相反作用力之间达成平衡，一旦扰动使之偏离，新的趋向均衡的运动便会发生（布鲁、格兰特，2008, p. 167）；杰文斯虽多用近似静力的分析，却明确强调均衡的动态性质，坦言“动的经济学还待人去发展”，并指出意志由各种动机的均衡所左右（杰文斯，1984, pp. 2, 37）。在此意义上，均衡不是静止的秩序，而是开放系统中相反力量不断被打破又重建的过程，是社会转型期面对不确定性的应对模式。把这一原理移入《拉米亚》第一部，便可见赫尔墨斯（*Hermes*）与拉米亚的交易乃是一次破坏均衡的扰动：自利凌驾一切，打破了克里特田园中相反力量相互维系的均衡。

拉米亚与赫尔墨斯的相遇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谈判。这并非外加的隐喻。沃尔夫森指出，赫尔墨斯本是商业之神，拉米亚正是诱他入“一桩生意”，他那缠绕双蛇的商神杖恰象征“商业世界中对手之间的互惠”，是“即将到来的讨价还价的恰当先声”（Wolfson, 2015, pp. 111–112）；这位神祇“绝非人类的恩主”（Wolfson, 2022, p. 365），不过是“贪

欲的猎手”（Wolfson, 2015, p. 112）。正如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所论，商业鼓励自由，因为每个人都受自利之心支配（Smith, 1979）。赫尔墨斯渴望隐匿的仙女，拉米亚渴望女子之身以追求她所爱的科林斯青年。彼此各执对方所欲，于是双方成交：

“你油嘴滑舌的蛇呀，灵感真不少！

.....

你尽可去享有你能想到的福祉，

只消告诉我那林泽女神的踪影，

她如今在哪里！.....”

蛇回答，“你要用誓言来保证，美神！”

“我起誓，凭我的蛇杖，”赫耳墨斯声称，

“凭你的眼睛，凭你星形的头冠！”（244）

这桩交易具备契约的全部形式要件。它以誓言封缄，两方各偿其诺，如同任何合同般履行完毕。济慈以神话诱惑的语汇框定这场交易。拉米亚毕竟是一条蛇，《创世记》中的蛇在场景背后投影，使经济意味更加凸显：诱惑与商业引诱共享同一语法，都以获利的允诺驱使行动者行动。

这场谈判的真正代价由交易之外的第三方承担。第一部的背景克里特岛是由“山谷”“树林”与“鲜花”构成的牧歌世界（241），赫尔墨斯本人称之为“可爱的世界”（241），居于其中的仙女“像空气一样自由、无形”，在没有荆棘的旷野中“自由地爱去哪里就去到那里”（244—245）。这桩自利的交易粉碎了这份自由，两方都未曾顾及仙女的意愿，蛇将仙女暴露于赫尔墨斯的目光之下，于是仙女“自己合拢来，就像 / 黄昏时自己昏晕的花朵一样”（246）。以动态均衡的眼光看，克里特田园的凋败即均衡被扰动的瞬间。科恩（Saul Bernard Cohen）在地缘政治学中区分秩序与均衡，强调均衡是动态的：开放体系中两种相对势力间的平衡被打乱后，可经引入新成分而恢复，在理想状况下经“看不见的手”自我纠正（科恩，2011, p. 63）。《拉米亚》所演示的恰是这一自我纠正机制的反面：自利一旦不被任何相反力量制衡，系统便不再趋向再均衡。

仙女以“不行动者”的身份补全了诗作的经济行动者类型学。与主动操控的赫尔墨斯和拉米亚不同，仙女全然被动，是诱惑的客体，却是全诗价值最密集的对象：“所有的森林神都向她跪拜礼尊”；海神特里同（Triton）们“向她的裸踝把珍珠倾倒 / 在陆上他们爱慕得形容枯槁”；她沐浴闲游之处“撒满了华丽的礼物，缪斯都不知道 / 只有从幻想的宝盒里可以挑选到”（241）。膜拜在此一律采取支付的形式，珍珠是爱慕的通货，厚礼超出幻想自身的库藏，而爱慕者为此形容枯槁。在诗作的经济学里，引动欲望的价值本身即已是一种诱惑，无论其拥有者是否有意如此。

科林斯场景则展示了失衡如何由家庭蔓延为城邦的危机。沃尔夫森径直称这座城市为颓靡的希腊城邦，其富庶经济由奴隶支撑（Wolfson, 2022, p. 363）。诗中的科林斯有“驾

车竞赛”（249）、“豪华的宴会”（255）与高大的门廊（256），表面繁华之下原已埋着劳役与不平等的暗影。拉米亚的现身向这座城市引入崭新而具腐蚀性的力量，当婚宴宾客抵达这座凭空出现的宫殿时，惊奇和艳羡在整场宴席间渐渐变质：

人群来了；每一个客人都忙乱，
走到大门前，猛然向里面观看，
惊奇地走进来：他们熟识这条街
.....但以前从来没看见
堂皇的门廊，建筑宏丽的庄园；
他们全拥入，惊呆了，好奇，敏感.....（263—264）

奢华由惊奇变为期待，标志着消费主义传染的完成。起初拉米亚的财富激起惊奇与艳羡；但当宾客们经沐浴、涂油与美酒款待之后，赞叹便演变为共谋，“一切灵魂都已经 / 摆脱人世的束缚”（266），那曾令人惊异的辉煌也渐渐显得“不足为奇”（266）。这一递进精确而冷酷：一次局部的失衡，沿着社会的纹理放大为系统性的失衡，最终威胁社会稳定。济慈的诗歌文本邀请我们追溯更古老的权威：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第八卷中论及，城邦内乱源于经济阶级差异所激起的妒忌与敌意（Plato, 1892, pp. 255–256）。无节制的奢侈消费并非只有私人后果的私人恶习，而是侵蚀共同体纽带的公共危害。

济慈的理想国度构想与微观经济学的动态均衡逻辑彼此呼应。理想之国并非弃绝欲望与交换，而是使相反力量重归平衡、使价值重新锚定于真实需要的政体；浪漫主义文学以想象力参与了对这一均衡社会的构想（Crosthwaite et al., 2022），正如布朗克所说，经济学家与艺术家同样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Bronk, 2009, pp. 1–2）。更进一层，这一国度想象也牵涉东西关系图式：浪漫主义所张扬的想象力既可能被帝国主义吸纳为扩张的思想资源（Makdisi, 1998, pp. 166–167；参 萨义德，1999, pp. 147–149），也可能反过来纠正“西方理性 / 东方感性”的二元偏见。《拉米亚》将东方奢华呈现为城邦失衡的根源，其锋芒既指向无节制消费，也隐含对浪漫东方主义自身的审视。围绕自利的私人化与消费主义传染而组织起来的国家不可能是理想之国，济慈以负像勾勒出他所肯定的动态均衡政体。

结语

从外在的商业生成，到内在的消费沉溺与交易计算，《拉米亚》为文学经济学“互构、同形、同归”的三层框架提供了文本印证。诗人的财务焦虑与商业语境的互构为《拉米亚》提供了生成条件；宫殿奢华与利西乌斯欲望的递减回报确立了诗与经济学的同形；拉米亚、赫尔墨斯的商业谈判情节则把失衡从私人领域推展至社会整体，使诗作介入城邦秩序的公共论题。诗作以悲剧收场，拉米亚消失、利西乌斯身死，这并非无端的悲情，而是世界观

崩塌的叙事形式。济慈刻意改写了素材的结局：伯顿笔下幻象揭穿，人与屋宇器物顷刻俱散；而济慈笔下宫殿无恙，拉米亚消失，利西乌斯身着婚服死于高榻，被消费的最终是消费者自身。杰文斯的边际主义以精确的分析绘制效用递减的曲线，却将道德判断悬置于经济学之外；《拉米亚》补足了这一悬置，它把消费欲望追至毁灭性的终点，并在灾难所清出的空间里，以否定的方式勾勒出济慈所肯定的共同体——不是弃绝快乐的世界，而是消费重新锚定于真实需要、价值不再由奢侈与炫耀制造、私人欲求不再侵蚀公共善的世界。济慈深知匮乏与过度之双重代价，他所秉持的不是道德家的禁欲，而是来之不易的节制。文学与经济学本自同源，皆以人的命运与福祉为怀。《拉米亚》表明，浪漫主义诗歌并非置身经济思想之外的反商业潮流，而是以想象力参与了对均衡社会与理想国度的构想。维护一个共同体的均衡，终究有赖于想象力对欲望的照亮与节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项目编号：22&ZD2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Funding: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British Literature” (Grant No. 22&ZD289).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g We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2221-5140>

Ye K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6197-0551>

References

- Bronk, Richard (2009). *The Romantic Economist: Imaginat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2008）：《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Brue, Stanley L., & Grant, Randy R. (2008).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ranslated by Di Xiaoyan et al.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Brydges, Samuel Egerton (1834).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Egerton Brydges*. Cochrane and M'Crone.
- 程文（2024）：“布莱克《耶路撒冷》中的边际主义与东西关系重构”，《外国文学研究》（04）：86-98。
- [Cheng Wen (2024). “Margin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 Blake’s Jerusale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4): 86-98.]
- 索尔·伯纳德·科恩（2011）：《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Cohen, Saul Bernard (2011).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translated by Yan Chunsong.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Comyn, Sarah (2018).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ovel: A Literary History of “Homo Economicus”*. Palgrave

Macmillan.

- Connell, Philip (2001). *Romanticism, Economics,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sthwaite, Paul, Knight, Peter, & Marsh, Nicky (Eds.) (2022).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rmanis, Porscha (2006). "Isabella, Lamia, and 'Merry Old England.'" *Essays in Criticism* (02): 139-162.
- Fermanis, Porscha (2009). *John Keats and the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agnier, Regenia (2000). *The Insatiability of Human Wants: Economics and Aesthetics in Market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llagher, Catherine (2009). "The Roman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James Chandl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1-100.
- Goux, Jean-Joseph (1990). *Symbolic Economies: After Marx and Freud*, translated by Jennifer Curtiss Ga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984): 《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1984).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Guo Dali. The Commercial. Press.]
- 约翰·济慈 (1997): 《济慈诗选》, 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Keats, John (1997). *Selected Poems by John Keats*, translated by Tu A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Keats, John (2002).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Rev. ed.), edited by Grant F. Scot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kdisi, Saree (1998). *Romantic Imperialism: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kdisi, Saree (2009). "Romantic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James Chandl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01-620.
- Plato (1892).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by B. Jowet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on, William (1769).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 W. Strahan.
- Roe, Nicholas (2012). *John Keats: A New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ncaglia, Alessandro (2017). *A Brie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爱德华·W·萨义德 (1999): 《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Said, Edward W. (1999).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Wang Yuge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Shell, Marc (1978). *The Economy of Literatu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dam (1799).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larendon Press.
- Stillinger, Jack (1974). *The Texts of Keats's Poe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gore, Proma (2000). "Keats in an Age of Consumption: The 'Ode to a Nightingale.'" *Keats-Shelley Journal*. (49): 67-84.
- Watkins, Daniel P. (1989). *Keats's Poetr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maginati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60).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Doubleday.
- Wolfson, Susan J. (2015). *Reading John Kea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lfson, Susan J. (2022). *A Greeting of the Spirit: Selected Poetry of John Keats with Commenta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mansee, Martha, & Osteen, Mark (Eds.) (1999). *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 Stud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Routledge.